



方的妻子从中国来日本过年，出去玩的时候，周围很多华人，当时他们就很警觉地戴了口罩。而在公司戴口罩，则会被同事调侃：“多虑了”。在日本市民眼中，新冠肺炎在中国的死亡率并不是很高，病故患者不少有基础疾病且年纪较大，况且大阪目前只确诊了一例，应该无碍。

大阪现在的一些公司也开始实行“错峰上班”的模式，但小方身边的朋友会利用错峰上班的时间去健身房锻炼，对于他们来说错峰似乎并不是为了防控疫情。而目前大阪还未采取类似公共场所测量体温等更多的防控措施。文和也告诉记者，学校速报里会提示有发热情况的学生，请自行在家隔离，会提供诊所联系电话，但需大家自行联系。

整体的感觉是日本将疫情的防控寄希望于企业和个人自身的决定，以至于大家也并不特别清楚要怎么做。日本歌手西川贵教2月26日还在网上抱怨自己不清楚演唱会到底是否要继续，批评政府没有给到民众明确的信息。最新情况是大阪市从2月29日开始，高中以外的学校开始停课，但针对这些决定，大家更多的是抱怨。

被诟病的日本公共卫生体系

事实上，疫情危机始于一个月前。1月20日，一名80岁的中国香港男子在横滨登上了载有约3700人的“钻石公主”号邮轮，在离船后6天，他于2月1日被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。彼时，“钻石公主”号正在返回日本的途中。

2月3日，邮轮提前抵达横滨港，由于船上已有人出现感染症状，日本政府决定禁止全船人员登陆，取而代之的是留在船上隔离14天。从一开始，就有专家对隔离的做法提出了质疑，认为将乘客和船员留在邮轮上的决定反而“加剧了疫情”。

日本感染病专家神户大学教授岩田健太郎在公开视频中描述，邮轮在感染控制方面做得很不够，连基本的安全“绿区”和污染“红区”都没有区分。“人们穿着防护装备到处走来走去，戴着防护手套在同一个地方吃饭，一些工作人员发烧了，去医疗中心时也没有任何保护措施。”而对于没有明显症状、检测阴性的人员，没有隔离，下船后也乘坐交通工具离开。

历来以严谨出名的日本，公共卫生系统真的如此不堪吗？日本主管健康和医疗的机构，是厚生劳动省（简称厚劳省），从1950年开始，日本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公共卫生体系，民间医疗也非常发达。在日本的公共场所，即便在平时，洗手液、酒

精消毒也均有配备，日本基本从幼儿园开始就普及卫生健康知识，至今形成了全民习惯。

至于为何对下船后的乘客不采取隔离措施，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须军认为，日本是民选政府，权力受到极大限制，所有的决定和行为均要有法可依。根据法律规定，只能劝说但不能强制做检查。日本政府更没有权力强制取消集会、让企业放假，或强制让公民待家里。

“只能劝告、建议，但不能强制，除非国家宣布紧急状态，目前充分调动资源的能力确实有限。”须军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如果把下船的人，集中放在日本境内隔离，一下子隔离3700人，依照日本目前的床位数量基本也不现实，而且不能征用宾馆、私人医院等。可以说，日本的“佛系”政策，一定程度上来说，也算是一种无奈之举。

“日本实际确诊人数并不知道有多少，这与检测门槛高有一定关系。”须军说，日本一位四个孩子的母亲2月21日在推特上发文，称儿子连续发烧咳嗽6天，去地区保健所要求医生给孩子进行新冠肺炎检测但被拒绝，理由是并不符合检测条件。

虽然日本政府承诺对已确诊患者，不分国籍，一律公费治疗，但在厚劳省给出的就诊指引上，官方确实设置了就诊门槛：建议37.5度以上、持续发烧4天、有强烈的倦怠感或呼吸困难的人，才需要到医院进行相关检查。甚至去医院前，要先给归国者咨询中心打电话，确认是否需要检测，检测时还需有公立保健所的介绍信，不然费用很高。

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2月26日在国会发言中称，2月18日至24日期间，日本平均每天为约900人次进行新冠病毒检测。这一实际检测数字远低于此前强调的最大检测能力的

2月初，带着口罩行走于东京浅草的中国游客。

